

第四章 八年抗战

五次“围剿”以后，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九十八师奉命移驻湖北，师部在汉口，二九四旅驻荆门当阳一线，旅部率五八七团先驻当阳，后与五八八团调防，移驻江陵（古之荆门）。

次年二、三月间，二九四旅又移驻武汉附近的湛家基。

处理郝守隆事件

当时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在南京陆军大学受训，由二九四旅旅长方靖代理师长职务。在他代理师长职务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师政治部主任向方靖报告：五八七团内部有共产党在活动，策划全团冲向日本租界闹事，目的在于挑起事端，打开全面抗日局面。

那时各部队抗日激情高涨，但蒋介石尚未下决心抗战，尤其在西安事变未久，“抗日”仍旧是极为敏感的问题。方靖闻报，当即去见武汉警备司令郭忏。

郭忏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十分严肃，他对方靖说：“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应立即采取强硬措施，把团长以下军官逮捕起来，

严加拷问！”

方靖对此事另有看法，不能接受郭杆的建议，便又乘车去南京，向师长夏楚中报告。

夏楚中对方靖说：“这件事闹大了你我都不得了。你赶快回去清查，迅速作出处理，千万不能手软——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方靖见师长也这样讲，不敢怠慢，当即转回武汉，在师部传令召见五八七团团团长王禹九及团军需主任郝守隆。此二人尚不知案发，来到师部，便被扣押起来。方靖又传令五八八团向敏思率部暗中将五八七团包围起来，然后去湛家基，集合五八七团训话。

在集合部队训话时，师政治部主任带着一些政工人员对该团营房进行了彻底搜查。他们首先在团部发现有一小图书馆，收藏着许多进步书刊及大量马列著作，又查获团军需主任郝守隆的日记簿及其它一些材料，证实郝守隆与共产党及要求抗日的一些民主党派有密切联系，策划冲击日租界，有六名连长参与，团长王禹九是积极支持的。

方靖觉得事态严重，当即对该团作了人事调整，命副团长侯思明代理团长职务，嘱其严密控制部队。

方靖回到师部，对查抄材料及王禹九、郝守隆口供进行了反复研究。他是同情抗战的，但又认为五八七团这样做实在太莽闯，弄得不好将祸及师、旅长，也是不可轻恕的。

他已经在二九四旅当了几年旅长，对部下自然有一番情谊，因为这一事件要株连六个连长一个团长，他不免于心不忍。

对王禹九更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十一师成立之初，罗卓英任参谋长，王禹九开始是罗卓英的随从副官，后来被分派到方靖营里当排长。这些年方靖每调一部队，便带着王禹九，一直提拔他当到团长。他了解王禹九十分能干，虽然出身行伍，但笔下很不錯，打仗亦勇敢，是难得的指挥官。因此更不忍将他牵连在内。

他考虑既然郝守隆是公开的策划人，无论如何开脱不了，便将一切责任都归到郝守隆一人身上。最后签呈上去，予以处决，对其他军官，一概不究。

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认为九十八师不可靠，要将该师调出武汉。方靖闻讯赶去向何成濬求情：“在目前情况下，主座这样做，未免太使九十八师难堪了。九十八师是陈辞公的基干部队，决不会发生哗变等情。如有差错，部下甘当军法治罪！”何成濬对方靖是很信任的，既然方靖作了保证，他也就放心了。

是年七月，陈诚来到武汉。当时王禹九尚在师部闲置，他想去向陈诚申诉一下，便去见陈诚。那知见面后，不容他开口，陈诚便冷笑说：“我不好意思见你，你倒好意思来见我！”说罢拂袖而去。

王禹九回到师部便被扣押，因为陈诚已电话下令给师长夏楚中。

“八·一二”上海抗战，九十八师先于月浦至宝山一线作战，十月间撤至广福。方靖等人力保王禹九，也因抗战局面已经打开，王禹九始得释放，暂于师部参谋部服务。尔后九十八师扩

充为七十九军，方靖正式任命王禹九为七十九军军部少将参谋长。

方靖一直很器重王禹九，尔后他升任十三师师长，保王禹九去该师任旅长，适逢部队编制改变，取消旅一级，改为一师三团制，因而王禹九调升不果。

一九三九年春，七十九军在江西安义、高安一带对日作战，因兵力对比悬殊，被迫撤退。王禹九请命率军直属部队掩护军司令部撤退，被日寇包围，在突围中，王禹九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八岁。其遗体由部下丁保良背出，葬于上高县伍桥乡。

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迫同意抗战。他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咨询对抗日的意见，何应钦首先发言，把库存武器装备报了个数字，结论是：“只能打三个月，三个月后如无外援，便不能继续打下去！”蒋介石听了，正中下怀，忙说：“只能打三个月，那还打什么呢？”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勃然起立，愤慨地说：“你们不抗战我就自裁！”当即叫卫士把手枪递给他。蒋介石本寄希望于这次会议，以便与日寇媾和；现在这点希望被冯玉祥将军一语破灭，只得十分尴尬地说：“好，好，作出最大牺牲！”

开赴上海 抗日前线

方靖所在的九十八师在第五次“围剿”后，原驻武汉一带。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奉命用轮船运往南京担任卫戍。十三日抵达南京，在下关登岸。得悉是日日寇悍然进攻上海，全师将士无不激愤，纷纷请命抗日，稍后即奉命开赴上海战场。十四日登车，于十

五日拂晓抵南翔。

下车后，方靖看到形势十分紧张，命令部队散开。随即六十余架敌机临空，肆无忌惮地低空扫射、轰炸。当时“国军”各部队均无高射炮，空军更不敢露面，只得听任倭寇肆虐。所幸部队已经散开，未受到大的损失。

九十八师当时的编制为两旅四团。师长夏楚中，副师长王甲本（在陆大受训），参谋长罗广文。二九二旅旅长吕国铨（在陆大受训），副旅长陈集辉，辖五八三团团长路景荣、五八四团团长胡一。二九四旅旅长方靖、副旅长龚传文，辖五八七团团长侯思明、五八八团团长向敏思。师直属部队有炮兵、工兵、辎重、通讯等营。每旅两团，每团三个营。每营有重机枪一连，每团有八二迫击炮一连；各连有轻机枪六挺。师部直属炮兵营有七五山炮六门。各种兵器以国产为主，质量较差。如此火力配备，与武装到牙齿的口寇相比，悬殊甚大！

十五日午后，九十八师进入上海市区。

当时是仓卒应战，上海战场上还只有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及孙元良的八十八师，这两个师归三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指挥，展开于真如至新市区马玉山路之线，对公共租界已完成攻击准备。九十八师进入战场，亦归张治中指挥。张治中将九十八师一分为二：二九二旅拨归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指挥；二九四旅拨归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指挥。

奋战马玉山路

方靖率部来到，王敬久便命他接下八十七师沈发藻旅的新市区马玉山路防地，继续向窜入公大纱厂之敌寇攻击。方靖心里雪亮：这是王敬久

蓄意保全自己部队的做法，也有藐视九十八师之意。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只暗暗发恨，同时立誓：我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让王敬久看看九十八师究竟如何！

当天晚上，方靖到前沿阵地视察地形，经交通壕进到趑船上，见市政府的一连武装警察在担任守备，三百米以外黄浦江内有两艘日寇军舰，舰上一片漆黑，处于临战状态；另有几艘英、美军舰，却还灯火通明，是一种隔岸观火、尚想坐收渔人之利的样子。再看看我方的防御工事却十分薄弱，倘若敌寇强行登陆，是可以得逞的。

方靖看罢，心情十分沉重，他已预感到一场异常艰巨残酷的战斗摆在自己面前。回到旅部，他私下对副旅长龚传文说：“从对峙态势来看，我没有信心必胜，我只有决心与阵地共存亡！”龚传文亦慷慨地说：“部下将是旅座的先锋！”

果不出方靖所料，八月十六日清晨，敌机开始轮番轰炸阵地，黄浦江中的敌舰也以每小时三百发炮弹的密度轰击，从早到晚毫无间隙。二九四旅虽然在内战中有过作战经验，却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火力压迫，一时几乎在阵地上站不住，大有崩溃之势。

方靖看到已是危急关头，必须效法陈诚处决刘天铎的手段以坚军心！于是集合部队，将一名在阵地前沿惊慌失措的营长枪决，并向部队训话：“蒋委员长在庐山训练团训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现在最后关头已经到了，我们只有牺牲！牺牲！！牺牲！！！”日寇当前，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有守土卫

国之责。若有人胆敢后退一步，立斩勿赦！”

军心稳定了。在以后的三天中，二九四旅再没有人敢在阵地前游动退缩。

由于日寇强大火力的压迫，我军白天行动受到限制，只能夜间行动。自八月十六日晚至十九日晚，二九四旅连续向公大纱厂一带守敌发动攻击。日寇虽然夜间无海、空军的有力支援，但是地面火力十分强大，以密集机枪组成火网。我方无足够火力加以压制，所以多次进攻均未奏效。

在此期间，我方空军亦间或出动支援地面部队，或是轰炸敌舰。但是由于速度和数量远远次于敌寇，所以一遇阻击即行返航。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架我方轰炸机执行轰炸敌舰任务，因被敌寇高射火器击中返航。飞行员为减轻飞机负荷，将携带的炸弹投下，当时飞机正飞行在南京路上空，距跑马厅（现今人民广场）很近，便打算将炸弹投入跑马厅空场内。由于仓卒测距有误，结果炸弹便落在大世界门前，数名路人遭殃！这样，二十日后，不复再见空军助战。

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因部队被拆散去找张治中：“既然把我部队肢解，我这个师长还留在前方何用？干脆让我带着司令部撤到后方去吧！”张治中无言可对，只得将九十八师调往宝山——月浦方面设防，归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

来接方靖旅防线阵地的，就是当年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员大队的中队长胡启儒。

胡启儒骑着高头大马，在一队卫士簇拥下，威风凛凛而来，见面就拍着方靖的肩膀说：“老兄多关照，少让我担任点任务

吧。”方靖尚以为对方是开玩笑，或者是谦虚，便打着哈哈说：“你的能力比我强，你率领的教导团素质比二九四旅好，何必客气呢？什么多啊少啊的，反正我奉命撤到新防线地，这里都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胡启儒问：“你的旅部在哪里？我们进去边喝茶边聊吧。”方靖朝对方眨了半晌眼睛：“开什么玩笑啊！现在是在战场上打仗哩，白天我们连一口熟食都吃不上，哪里还谈得到品茶啊！只要举火冒烟，日寇飞机就来轰炸，也会成为日寇海军炮击目标！等打完仗，我请你吃鱼翅海参席，边吃边聊，等最后一道菜——熊掌。可是现在啊，只有请你直接跟我去前沿看看阵地，你也好部置接防。”

还没有接近前沿，胡启儒便被日寇海军雨点般的炮击吓破了胆，转身上马：“老兄，我要走了——部队交给你指挥。成功你当英雄，成仁你为烈士，我是不能死在这里的。”

方靖眼看胡启儒提缰拍马要溜，气得大喝一声：“站住！你再跑，老子毙了你！”胡启儒回头见方靖已提枪在手，只得勒马而回，哭丧着脸，对方靖说：“你我黄埔同窗，相煎何太急！”方靖叹了一口气：“我何尝逼你！你这样临阵脱逃，就不怕军法制裁吗？”

抗战后期，胡启儒官至云南师管区中将司令，因为种植、贩运鸦片烟被人告发，一时舆论大哗，蒋介石下令将其逮捕。他的妻子是宋美龄的干女儿，还要胡启儒当宋的干儿子。虽然有这么个靠山，终因舆论压力太大，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将他处决。这是后话。

当时各方面后继部队尚未到达，因此投入抵抗的部队的任

务是坚守待援。

**死守宝山
——月浦线**

九十八师在宝山——月浦一线布防情况是：以二九二旅五八三团守备宝山及狮子林炮台一线，阻止日寇登陆；五八四团为预备部队，由师长夏楚中掌握；二九四旅在月浦以东地区，构成村落防御阵地。由于二九二旅旅长吕国桢在陆大受训未归，夏楚中将五八三团指挥权亦交给方靖。

二九四旅阵地前有日寇两个联队疯狂进攻，同样以炮击、轰炸为助。日寇还放出气球侦察炮击、轰炸目标，观测袭击效果，所以其命中率极高。

一日，方靖召集副旅长及三个团长在旅部研究作战方案。会后围桌午餐，突然一发炮弹落在旅部附近，炸毁一所民房，砖瓦灰石飞入旅部院内，门窗上的玻璃全碎，房顶尘土雨点般下落，机关人员顿时大乱。

方靖见此情况，大喝一声：“不许动！”便起身遮住桌上的饭菜，减少尘土污染。稍顷，摘下帽子掸掸尘土，举起筷子对团长们说：“来，我们继续吃饭吧。”几个团长哈哈一笑，抄起碗筷，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

惊慌乱窜的旅部官佐们，见旅、团长犹在谈笑风生，也就自然安定下来。

刚才那一发炮弹，方靖凭多年作战经验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敌人已发现旅部所在地，一是试探性的。属于前者，一炮不中，敌人会校正距离，再行炮击，这就必须转移；属于后者，一炮之后，敌人发现不了我方动静，便会转移射击目标。

当时方靖看到旅部官佐惊慌逃窜，便想到倘若匆忙转移，秩序混乱，更易暴露目标，招致密集炮火；司令部动乱，影响前沿阵地军心的稳定，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所以他宁可坐等敌人校正后再度炮击，也不愿贸然下令转移。

以后敌人的炮弹带着呼啸声从旅房屋顶飞过。“敌人的火力延伸了”！方靖这才深深地喘出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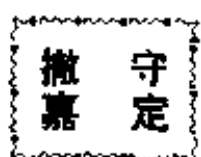
九十八师在宝山——月浦一线作战一个月，补充了三次，成连成排士兵补充上去，很快就伤亡过半。从前沿阵地抬下的伤员，往往在痛苦的呻吟时喊叫着问：“长官啊，我是在哪个部队负的伤啊？”足见当时情况紧迫，新补充上来的士兵，连自己是编在哪一个部队还没有搞清楚，就投入了战斗。除士兵外，伤亡营长以下军官达二百余名之多！另外还阵亡团长、副团长各一名。

在这次战役中，最为壮烈的是据守宝山城的二九二旅五八三团第三营。该营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战斗得十分顽强。在日寇陆、海、空三面袭击下，伤亡惨重，经过三次补充，仍大量减员，处境危急。夏楚中接到报告，拟将该营撤下来。方靖指出：倘若宝山城失守，防线将出现缺口，敌寇拥入，侧背迂回袭击，整个防线势必崩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继续补充兵员，并设第二道防线。日寇为了孤立宝山阵地，以炮火封锁周围，使增援部队难于靠拢。姚子青和全营将士宣誓：“与阵地共存亡！”他们坚持达七昼夜，最后全营将士壮烈牺牲！

姚子青营这一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事迹，成为当时京沪报纸宣传抗日的头版头条新闻。事后在武汉将一条街以姚子青的

名字命名，来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

正当与倭寇激战中，上海保安总队队长吉章简打电话给方靖，极其兴奋地说：国共两党已达成协议，再次合作，共同抗日。方靖听罢也欢呼起来。他对副旅长龚传文说：“江西五次‘围剿’尚是昨日之事，共产党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主动提出联合抗日，一致对外，是应该刮目相看的。我们赶快把消息通告全师将士，一定鼓舞士气！”龚传文深表同意。果然，全师将士欢呼不已，大大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守之决心。



九月初，十一师、三十六师、第一师、第九师、六十师、九十师、五十九师、三十二师、十三师、第六师以及两广、川滇黔等部队先后开到上海战场，投入战斗。九月十日，第一师胡宗南来接替九十八师防地，方靖将战守的残酷性告诉胡宗南，胡宗南很不以为然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看我们的吧！”不料上去第一天，部队就几乎垮下来，骄傲不可一世的胡宗南不得不承认：“九十八师在这里坚守一个月，实在了不起！太不容易了！”

九十八师于九月十日晚奉命撤至嘉定县城，一面整训补充，一面构筑外围预备阵地。

蒋介石为了鼓励各部队的战守决心，明令发表：胡宗南为第一军中将军长；李延年为第二军中将军长；王敬久为二十五军中将军长；宋希濂为七十一军中将军长；夏楚中为七十九军中将军长。

九十八师在嘉定经过一个月的整训补充，外围工事基本就绪，复于十月二十日晚奉命接替十三师在广福方面的阵地。这

时九十八师副师长王甲本和二九二旅旅长吕国铨已由陆军大学提前归部，军长夏楚中即将二九二旅部队仍交吕国铨指挥。吕国铨求胜心切，在敌情不明情况下，当夜向敌阵地发动猛烈攻击，结果陷入敌人的火网之内，奋战一夜，二九二旅四个营的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次日早晨，方靖率二九四旅补充上去，在前沿阵地举起望远镜一看，果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惨不忍睹！当时双方尚在交火，只能待夜间派人去收尸。夏楚中闻报，将吕国铨骂得狗血淋头：“你在陆大是怎么学的呀，这叫什么战术，好好四个营被你断送了！”从此他对陆大毕业的人不信任，认为他们只能纸上谈兵，不能重用。

上海战役原订的作战计划是：十月底我军主力撤至吴江、福山一线阵地，另以坚强部队占领江阴——无锡——海盐一线，从事整补。这样，虽败不乱，尚能继续予追来之敌以重创。但是此时蒋介石迷信所谓“九国公约”因开会制裁日本侵略者，命令各部队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两周。日寇利用这一时机，由仰光平助率领两个师团和八十余艘战舰，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占松江，袭青浦，从侧面迂回，迫使我军仓卒撤退。

十一月十二日晚，各军开始总撤退。

接到总退却的命令时，各军都幻想在常熟、昆山等线有既设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可以持久抗战，待机反攻，所以尚不气馁。

九十八师奉命撤至嘉定预备阵地，以掩护右翼友军安全转移。十三夜间，始由嘉定向太仓方面撤退。

原来的撤退计划是在太仓分路口处，十九集团军和二十一集团军都向右撤往常熟，其它部队向左撤往昆山。由于敌机追袭，造成混乱，十几个师一齐拥向常熟公路。敌机缠住不放，先投照明弹，然后俯冲扫射、投弹；加之各部队夺路奔逃，互相残杀，以至造成重大伤亡。当时任何人也控制不住这混乱局面。方靖看到如此惨状，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

十一月十五日，九十八师抵达常熟，二九四旅迅速进入城东既设阵地，二九二旅担任城防守备。

方靖接到命令，却无法执行。因为所谓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地图不知在谁之手，不明工事位置，如何进入阵地？派人沿公路两侧搜寻，发现一些坟堆，料想是工事的掩体，于是刨开坟堆，大部扒出的是棺材，只有十几处是钢筋水泥做的机枪掩体。再向纵深寻找，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国防工事”。那几处“工事”，也是铁门紧锁。当地老百姓讲：钥匙都在保甲长们手中，而保甲长早已逃之夭夭！方靖只好命人撬门而入，命令各连赶紧补筑步兵掩体。

二九四旅所进入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实际上只不过是仅能容纳一个班的地堡而已。工事之间，既无地道，也无战壕，形成单独作战单位，没有纵深工事，则既无后援，也无二线可以退守。后方粮食弹药无法向“工事”输送，也无法补充兵员，只能利用夜色掩护，但是，日寇突然施放照明弹，不少运输者作了无辜牺牲。看到这些情况，将士们无不愤慨地诅咒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

据说在“永久性国防工事”竣工后，南京大员曾前来视察，坐着汽车飞驰而过。大概承包者摸准了这些大员的脾味，决不会下车认真检查，所以只在沿公路旁边搞了些样品敷衍。

方靖正在前沿指挥作战，忽接副师长王甲本电话，说城内发生乱兵抢劫银行、钱庄等事，要求方靖派部队进城弹压。方靖当即拒绝：“副座，现在城内处于混乱之中，倘若我部派兵进城弹压，就有可能被人诬告是我部在城内抢劫，一切严重后果就要你我承担了！”王甲本听罢说：“言之有理！”次日方靖偕同王甲本进城，看见一家钱庄门前，倒卧数不清的尸体。有一具尸体下面，还压着一个钱箱。这显然是在争夺钱财时互相践踏、互相残杀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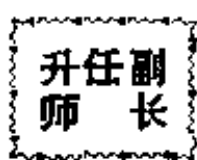
九十八师在常熟奋战了四昼夜，继续撤退。苏州、南京都未能守住，一直退到安徽徽州，才与六十七师相遇，共同组织防御。

上海总退却之前，原十一师师长黄维刚从德国深造回来，调任六十七师师长。撤退中，六十七师也打得十分艰苦。

方靖与黄维交情甚厚，两个老朋友见了面，方靖对黄维说：“伙计，你不要走啊！”黄维说：“我不走了。只是防务我不能担得太重啊。”夏楚中亦是十八军的老人（十四师编入十八军时的团长），与黄维也有交情，所以竭力挽留，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彼此！你担负一部份，剩下的我们包了就是。”

到了徽州，军令部将七十六师王凌云部缩编成一个旅，拨归七十九军建制。又由方靖从九十八师带去两个团，也编成一个旅，属七十六师。这样七十六师有两个旅四个团，王凌云仍

任师长，方靖升任副师长。



七十九军成立之初，仅有九十八师一个师，所以军长夏楚中兼九十八师师长。七十六师归并后，已成为有两个师的完整军，夏楚中再兼师长就不相宜了。军令部嘱他保荐一人接替师长职务，他却迟迟不荐，后经人试探夏才透露他的打算：“我要找一个湖南益阳同乡来接我的九十八师！”此事为副师长王甲本得知，遂结怨甚深。

夏楚中的乡亲观念十分浓厚，在七十九军中流传这样的笑话：有两个湖南益阳人去找夏楚中，要求在军队里安排个职务。夏问甲：“你是哪里人？”甲答：“湖南益阳。”夏又问：“你想干什么差事？”甲又答：“我想当连长。”夏转问乙：“你呢？”乙答：“益阳……”夏忙点头：“啊——‘一样’，你也要当连长，好嘛，是湖南益阳人我都用。”于是批个条子，补充到团里当连长。此二人目不识丁，更无军事常识，连步枪也不会摆弄，下到连队怎能不闹笑话呢？他的这种做法，竟在七十九军中形成了习惯势力。后来方靖任七十九军军长时，调九十八师师长向敏思升任副军长，向的遗缺，由该师副师长胡一升正，而胡一的遗缺，方靖拟调一九四师五八二团团长赵鹤庭升任；向敏思却要保荐九十八师少将高参詹杨清升任，理由很可笑：“詹杨清是湖南益阳人，夏楚中的同乡；七十九军是夏楚中创立的，理应用夏楚中的人。”方靖还不得不承认这种混帐逻辑。

蒋介石对其嫡系各将领，非黄埔出身不用；夏楚中又非益阳人不用。急切间又哪里去找既是黄埔出身的又是湖南益阳人呢？在夏楚中悬而未决之际，罗卓英却将其同乡广东人莫与硕

派到九十八师当师长，使夏楚中的企图落了空。

莫与硕的乡亲观念实不亚于夏楚中，他到任不久，几乎把九十八师办成了广东会馆。这就使王甲本既恨莫与硕，更恨夏楚中了。

方靖在七十六师任副师长也处境困难。

王凌云本是河南耍杆子出身的，后来投到李延年手下。此人擅于阿谀逢迎，李延年有抽大烟的嗜好，王凌云便寻求顶好的鸦片送去，取得了李延年的欢心，因而得以重用，步步高升，最后李延年将其创建的七十六师交给了他。这事遭到黄埔将领的攻击，都说李延年不应该，因为当时尚有许多黄埔同学无兵可带哩。李延年并不理会，尔后甚至将第二军也交给了王凌云。这是因为李延年自知有吞云吐雾之好，怕用了黄埔同学将他的基干部队篡夺；王凌云没有根基，只有依靠他才能立足，把部队交给王凌云是比较可靠的。

王凌云正因为没有根基，看到突然派来方靖这样一个有资历的黄埔将领担任副师长，不免心怀鬼胎。事有巧合，七十六师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是黄埔四期的，与方靖有同窗之谊，王凌云更怕方靖联合这两人篡他的权，于是暗中派人监视。为了不使他们有接近的机会，还将副师长与参谋长的办公室分别设在楼上、楼下。更有甚者，密令通讯营：凡副师长与别人通电话，总机要详细记录向师长报告！

方靖得知这些情况，真气得七窍生烟！他见王凌云如此短见，想必不可理喻；又见九十八师被莫与硕闹得不成样子，不免心灰意懒，便写信给他的老长官陈诚，请求调离。

接任十三师师长

四个月后，即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师参加台儿庄大战，在鲁南突围之时，师长吴良琰与部队脱离联系，陈诚便命方靖接替十三师师长职务。

在此期间，七十九军闹了很大风波：王凌云受不了夏楚中的约束，企图将七十六师拉去投九十四军侯镜如，但是他下面两个从九十八师过来的团长不答应。部队几乎闹垮，最后蒋介石只得将七十六师仍拨归李延年指挥；莫与硕不得人心，下面旅团长们闹起来，陈诚也只好将他调走。

夏楚中这时被弄得十分狼狈，又见方靖已当了师长，觉得再不让王甲本升正，于情理上也说不通，只得保荐王甲本升任九十八师师长。王甲本尽管升正，窝的火却尚未发泄出来，莫与硕离开九十八师时，将师部一辆小轿车带走。这种升迁时的顺手牵羊，在国民党军中本是司空惯见。当时王甲本也未表示反对，却暗中遣卫士排在中途拦截，强令莫与硕下车，将车开回。事情闹到夏楚中面前，夏楚中埋怨王甲本未免做得太过，要他把小轿车给莫与硕算了。王甲本却坚持将小轿车扣留，并与夏楚中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莫与硕后来升任八十六军军长，属三战区指挥。在浙江衢州作战时，因作战不力交军法问罪，关押在重庆北碚军人监狱中。抗战胜利后，放任广东省接收大员，在接受日寇物资时大肆贪污，事为张发奎所知，即令逮捕处决。

“接收大员”贪污受贿之事，当时已是普遍现象，却未闻有此严厉处置者。张发奎处决莫与硕，据说是为了给他的粤系将

领张德能报仇。原来一九四〇年长沙会战时，张发奎部第四军奉命撤退，军长张德能指挥失当，辎重未能在一夜之间全部渡过江去。日寇赶到，一场激战，第四军损失惨重，蒋介石遂下令将张德能枪决。莫与硕是黄埔第二期毕业的嫡系将领，所以有此一说。

方靖接到委任令，想起当年自己因装甲车事件在江西临川被十三师扣押，如今却要去十三师当师长了，对如此巧合，不禁苦笑起来。

这时十三师正在平汉路横店方面。

方靖到武汉，先去见参谋总长何应钦。

何应钦跟陈诚是冤家对头。方靖虽然是陈诚军事集团中一员，但因何应钦曾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代校长，与方靖另有一番师生之谊，所以他对方靖不存芥蒂，而且十分友善。

何应钦听方靖说要去十三师上任，就连连摇头：“这个部队把师长都扔掉了，你去，能带得了吗？”方靖正因为这事担忧，才来见何应钦的，于是顺水推舟：“是啊！部下正愁带不了，才来向总座请教啊。”他见何应钦沉吟不语，便将他一军：“假如总座也别无良策，部下请求他调，或仍回七十六师原职。”

何应钦颇有儒士之风，虽是军人，对下属从不用粗话喝斥。他擅于思考，所以又以沉稳著称。他并不急于回答方靖的问题，一手背后，一手扶着眼镜，在房里踱了一阵，然后站在方靖面前，取下眼镜，掏出白手帕来，一边擦着镜片，一边对方靖说：“这样吧，我教你一条脱胎换骨之计……坐下谈，坐下谈。”

方靖待何应钦先入座，自己才在对面坐下，挺胸平视，双

手放在两膝之上——这是军人坐的标准姿势。何应钦戴好眼镜，含着笑慢条斯理地说：“你有两个旅长，四个团长。你把一个旅长调军委会，一个旅长提升师长；一个团长升旅长，一个团长升副旅长。你再把你过去的部下调四个来，充任旅、团长。这样一来，岂不是全师都在你的亲信控制之下吗？”

方靖慌忙起立，连连鞠躬：“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总座教诲之恩，部下没齿不忘！”

何应钦的“脱胎换骨”之计果然十分灵验。此后方靖每到一个新的部队都如法炮制，居然百试而无一误，所以陈诚经常夸奖他：再难弄的部队，方靖都有办法整顿好！却不知方靖的招数正是他的对头冤家教的。

方靖刚把人事调整好，却又节外生枝：被将士扔掉的吴良琛找到武汉来了。吴良琛也算得陈诚系统的人，方靖觉得人家被部队扔掉，已属可怜，再要丢了官，未免太惨了。反正自己靠陈诚提携，不怕没有官做，所以他打算把十三师让给对方。为了这事，他去汉口警备司令部拜访警备司令郭忏。

郭忏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是陈诚的左右臂，与方靖私交甚密。方靖每有疑难而又不便直接找陈诚，都是拜托郭忏代为进言的。当时郭忏还兼任九十四军军长。

叙谈阔别之情后，方靖把自己同情吴良琛的意思说出。郭忏听了频频摇头：“你当了五、六年旅长，谁曾同情你？上次有个机会，我在辞公面前保你任十一师师长。辞公说：七十六师已被我们拿过来了，下一步便是让你升任七十六师师长。其实那时七十六师还在李延年操纵之下，一时拿不过来，但我又

不敢对辞公明说。这次好不容易有了十三师的缺，这个部队建立已久，比七十六师强多了，只要你好好带，一定能干出成绩。你干你的吧，辞公派你去是为了壮大我们的势力，吴良琛自有人安排的。”

方靖这才恍然大悟，就顾不得吴良琛了。后来吴良琛去找陈诚，被留下当高参。

三见蒋介石

十三师官兵正在横店方面构筑防御工事，昼夜兴工，十分劳苦。正在这时，方靖突然接到蒋介石召见通知，顿时紧张起来，因为虽然距上次“遭见”已经四年，但是对这位委座盛怒时的脸色，以及不顾体统的粗野言辞，都还记忆犹新。方靖每一想起便不寒而慄：“我这一辈子能不再见他才是幸事哩！”然而，现在只能是“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不得不强自镇静，仔细考虑应作哪些准备。

方靖考虑到，自己新到十三师，蒋介石有可能问到部队的情况；部队正在修筑防御工事，蒋介石也有可能会问这方面的情况。于是他带了阵地配备图和全师营以上军官花名册，把个军用皮囊塞得满满的。

一切准备停当，方靖先到武汉行营交际处，由处长竺明韬派员引导他到交通银行——蒋介石在武汉的临时办公处。

侍从副官将方靖引上二楼，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并不在办公室里，他只得立正屏息，足有三分钟之久。由于精神极度紧张，以至全身肌肉绷得极紧，真无异于熬受酷刑。

蒋介石的马靴声由远而近，仿佛在方靖的耳边擂响了战鼓。他的心跳加速了，呼吸也短促了，几乎不能自持。

蒋介石走进办公室，对方靖的敬礼只不过点点头，便去办公桌前坐下。方靖感到对方的目光长时间地在自己身上转来转去。

“唔——这个……这个……十三师的官兵士气如何？”蒋介石终于开口发问了。

真是没话找话说！谁又敢回答“士气一蹶不振”呢？方靖猜不透这闲话背后隐藏着什么，只得小心翼翼地回答：“报告委座”十三师官兵士气很旺，正在构筑防御工事，虽然艰苦，却十分努力。”

蒋介石频频点头，露出了笑容。其实这一问是多余的，回答也是理所当然的话，何至于高兴呢？方靖意识到蒋介石是在有意表示高兴，好象在明确告诉他：“今天召见你，我是满怀善意的，你不要害怕嘛。”很可能蒋介石已从方靖的神色上察觉了他的精神十分紧张。

“九十八师在上海抗战抗得不错嘛，今后要更加努力啊！”蒋介石保持着笑容继续说。

上海抗战已是一年前的事，而且论功行赏，九十八师师长已升军长，旅、团长也各有升迁，至少也得了勋章。这些往事又何必重提呢？方靖意识到这是蒋介石进一步向他表示善意。既然如此，他觉得自己也不能辜负蒋的善意，赶紧奉承：“上海抗战取得辉煌战果，使扬言三个月征服全中国的倭寇丧胆，全赖委座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他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象放电影似的闪过太仓——常熟公路上敌机狂轰滥炸下的血肉横飞惨景。这一切不正是他面前这个自命不凡的领袖造成的吗？

蒋介石被方靖奉承得咧开满是假牙的嘴，真的笑了：“唔，唔，是的，是的。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同仇敌忾，何愁东洋人不灭！抗战是艰苦的，长期的，我们要作出最大的牺牲！”

“委座明鉴，有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子孙，决不能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抗战必然是艰苦的，但是，我们有决心，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唔，唔，是的，是的……”蒋介石收敛了笑容，显然方靖刚才的话并不投机：“这个……这个这个……现在我们又要在武汉跟东洋人决战了。”他突然转变了话题：“决战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所以今天召见你，了解一下十三师的部署和构筑工事的情况。”

这时方靖的情绪已逐渐平静，又因为早有准备，所以从容地从皮囊里取出军用地图，摊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他便指着地图，不慌不忙地讲解十三师的兵力部署及构筑工事的情况，讲完便退到一旁静候指示。

蒋介石双手撑着办公桌，俯身仔细地看了地图，半晌，然后退回原位坐下：“你们构筑的防御工事大多是一线式的，缺乏纵深。倘若第一线被敌人突破，没有第二线退守。何况一线式的工事，也容易被敌人从侧面迂回突破！”

真是一针见血道破了弊端！方靖心悦诚服地说道：“委座英明之至！部下回去后，一定赶紧补筑纵深工事。”

蒋介石示意方靖把地图收起来：“保卫大武汉要准备打大仗，作出最大牺牲。你要抓紧构筑工事，同时勤于训练部队，尤其注重射击教育。你回去准备准备，日内我要去巡视，就便看看你们部队的攻防演习。”

蒋介石口口声声说要在武汉打大的战役，但是当时在武汉的部队，除十三师以外，只有郭忏的九十四军一八五、一二一及五十五三个师。这点兵力，如何能打大的战役呢？何况九十四军还是新成立的部队。

在国民党军中，蒋的嫡系、杂牌和地方部队的待遇各种各样；经过淞沪、南京两大战役后，参战部队的装备及兵员损失极大，急需补充。但是，一些杂牌军、地方部队与军政部（何应钦兼部长）挂不上钩，得不到补充，也无人过问。陈诚这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正需要加强守备兵力，兼之趁机扩大其军事集团实力，所以杂牌军、地方部队向他投靠，他都乐于收容补充。例如原属韩复榘的五十五师，补充后派其亲信部将柳明标为师长；原武汉警备旅经补充后扩编为一八一师，派其亲信部将方天为师长；原属贵州地方部队的一二一师早已改造，也是陈诚军事集团中的将领毕庭芳为师长；又以卫戍总部参谋长郭忏兼九十四军军长。经过这样人事调整和补充，部队是完整了，却还有待训练，加强作战能力。因此方靖认为仅靠这点兵力，连守备都很成问题；假如日寇溯江而上，即由鄂东向西进犯，没有强大的预备兵力，是抵抗不住的，哪里还谈得到保卫大武汉呢？但是，他一个小小的师长，哪里敢去打破蒋介石的葫芦，看里面到底藏的什么药呢？

方靖回到师部，收到蒋介石犒赏他的“特支费”一万元。在抗战初期，纸币贬值尚不十分明显，所以仍旧可以称得起是一笔重赏，比之第一次召见多了十五倍。但是，“无功不受禄”，方靖眼下功在那里？不错，在召见时提到了上海抗战，但那已

经以一枚二级宝鼎勋章作了奖励（注），没有听说受勋者得“特支费”，更何况时过境迁。所以只能看作是蒋介石自认上一次装甲车事处置失当，现在略施小惠加以弥补。从方靖后来谈装甲事件竟无怨言来看，这一施恩手段是很成功的。

从召见的当天开始，十三师官兵便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方靖更是忙得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了，成天骑着战马在各团奔跑，督促加紧准备演习。

次日一早，军训部副部长刘式毅率领数名参谋来十三师，说是奉蒋介石之命，来协助方靖准备攻防演习。方靖求之不得，赶紧唤来参谋主任杨达，命他与刘式毅等共同商议如何进行。

第三天，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时，方靖正在准备搞一次预习，忽接蒋介石手令：

十三师师长方靖：

顷悉日寇矶谷兵团由光山窜入宣化店，有向柳林切断我平汉线企图。着十三师立即集结于横店以北地区，当夜乘汽车输送至宣化店，务歼来犯之敌！已伤准备汽车一百五十辆。此令！

蒋中正即日

真是一场冤枉的劳师动众！

血战柳
林车站

军情十分火急，片刻不得延误，方靖当即传令部队跑步至指定地点集合。

日寇的企图是很明显的，侵入宣化店，继续

（注）国民党勋章分四级：第一级“青天白日”，第二级“宝鼎”，第三级“银毫”，第四级“胜利”。

向西进犯，切断我平汉线南北交通，阻我援军南下，以策应长江下游之敌进犯武汉。

九月二十日下午五时，十三师赶到宣化店，可是日寇已越过宣化店，西攻九里关。方靖当即率十三师向九里关急进。

二十一日晨，十三师先头部队抵达九里关附近，发现日寇已占领九里关村落，设好防线。方靖命令三十九旅发起进攻。

日寇作战十分顽强，当面之敌不过是矶谷兵团后卫部队约一个大队，抵抗一个旅的猛烈攻击，死守不退。至晚，在夜幕掩护下，我方包抄上去，才歼敌大半，余敌溃退。

二十三日晨，十三师追击至柳林车站以东地区，发现日寇已占领车站及铁路东西两侧一带高地。方靖观察敌情后，兵分两路，一路三十七旅沿铁路以西向北，一路三十九旅由东向西，协同对车站守敌进攻。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甚旺；我方由下仰攻，兼之炮火威力太小，不能压住敌寇火力，所以在进攻中颇有伤亡。

进攻持续了三个昼夜，我军只能在夜袭中求得一些进展。

二十六日晚，我攻击部队接近敌人阵地，使其占绝对优势的炮火无法施展，始能杀伤大量守敌。二十七日晨，守敌终于溃退至车站以北，仍然守住铁道两侧一带高地，负隅顽抗。

方靖进入车站，查点敌人储存的物品，武器弹药已被日寇劫走，只剩下数百包大米。

在柳林车站，方靖收到胡宗南的电讯：敌之一部已窜至信阳以南。形势仍然十分紧张。

当十三师正与日寇争夺柳林车站的时候，公秉藩的三十四

师及刘和鼎军长率领的一个师，由北面钻隙经柳林车站向武胜关方面开去。武汉军委会原派武汉警备司令罗卓英来鸡公山指挥作战，也在这时将指挥任务交万耀煌，回武汉去了。方靖顿然悟到，这是在调兵遣将，准备在武汉打大的战役。

十三师在柳林车站以北高地一带，与日寇形成对峙状态。这时，孙桐莹的二十三师开到柳林以南的李家寨附近，以为声援，却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十三师连续作战多日，已经十分疲劳，几次向日寇发动强攻，由于攻势不够凌厉，未能奏效。

罗卓英曾命第一军努力向南攻击，与十三师会师，第一军却始终未有进展；十三师也没有完成歼敌任务。这样一来，敌寇切断了信阳以南交通线，使集中豫南的部队不能调至武汉，北方二十万补充新兵也不能南下。后来保卫大武汉的计划流产，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十月十七日，十三师奉命将阵地交廖磊的一七二师，部队回师武汉参加保卫战。

陈诚以武汉卫戍总司令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全权策划保卫大武汉作战计划。他任命薛岳为江北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为江南兵团总司令，先在皖西、马当、湖口地区进行防御战，继在赣北、南浔铁路线以及鄂东长江两岸展开战斗，半壁山、田家镇争夺战尤为激烈。

十月十二日，日寇在广东大鹏湾强行登陆；十月二十日入侵广州；十月二十三日信阳失守。

日寇对武汉已形成南北夹击局面，陈诚只得忍痛于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

十三师奉命在武昌以南粤汉线贺胜桥一带设防，掩护大量军用物资南撤。

日寇约一个旅团的兵力由黄石港、大冶方面向贺胜桥以东的牛镇突破后，继续向贺胜桥西进，企图截断粤汉路交通线。由于十三师英勇抵抗，日寇屡攻不克，扔下大片尸体，转而攻占贺胜桥以南的咸宁县城，将贺胜桥包围。

酣战中，武汉警备总司令罗卓英率总部撤至贺胜桥，脱离了他所指挥的关麟征和甘丽初两个军。

方靖闻报，大吃一惊，急忙跑去相见。

“总座怎么到这里来了？”方靖行完军礼后问。罗卓英尚不明白，反问：“这里情况如何？”方靖伸右手转圈一指：“贺胜桥已被日寇包围了！”

罗卓英犹不肯相信，于是登上高地举起望远镜四下观察，只见日寇已组织好兵力，开始由咸宁方面发起攻击。看罢便跌足道：“唉！果然被包围了——我们倒撞进网里来了！现在该怎么办呢？”方靖倒还沉着：“请总座放心，这里还有一个团的预备兵力，可以派出两个营护送总座渡河突围，部下在这里吸引住日寇，等总座突围后，部下再率部突围。”罗卓英握着方靖的手说：“好，全仗你了！”

方靖派一名副团长率两个营护送，并对该副团长说：“此去务须小心谨慎，不把总座送到安全地带，就不要回来见我！”在国民党军中，下命令使用“不要回来见我”这一习惯语，等同于“提头来见”，是一道死命令。罗卓英听了十分感动，再一次握着方靖的手：“好，后会有期！”这句话包含了“必不忘你”的

意思。

罗卓英于下午两点离开贺胜桥。

方靖将旅、团长召集到指挥所：“现在必须拖住敌寇，掩护罗总座安全突围。各阵地加强火力，做出四面突围势态以吸引敌寇，坚持到晚上六点，然后按顺序撤至咸宁以南汀泗桥集中，再进行抵抗待援。撤退时，我带一个营为后卫掩护。六点以前谁要先撤，当以临阵脱逃论处——杀！”

下完命令，方靖骑上战马在各阵地来往奔驰，指挥作战，鼓励士气。有时还亲到前沿，与士兵同在战壕里向疯狂进攻的敌人射击。官兵们见师长如此，顿时斗志昂扬，各阵地都打得十分坚决。

方靖亲冒炮火，如此卖力，原因倒不在于罗卓英的官位，而因为罗卓英是陈诚军事集团中仅次于陈诚的第二号人物。

十三师秩序井然地撤至汀泗桥后，方靖派出数路人马探听罗卓英下落。得知罗卓英已平安绕道咸宁往东撤走，这才放心了。

罗卓英突围后，逢人便夸方靖：“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勇敢、坚决！”方靖一时声誉大增，尔后陈诚调方靖为十一师师长，晋级中将，这与罗卓英大有关系。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师调往湖南常宁县改编整补，取消两旅一团制，改为一师三团制，另设一个补充团，改编后，归属七十五军（军长周福）建制。师长方靖，副师长朱鼎卿，参谋长杨达，步兵指挥官余跃龙。三十七团团长陈诚武，三十八团团长张杰，三十九团团长何义标，补充团团长谢俊汉。

驻当阳保卫江防

一九三九年二月，部队开到湖北宜都整训。五月，经军委会校阅后，开至当阳、河溶等地整训。此时七十五军归属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郭忏指挥。而整个江防部队，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长官司令部设在襄樊以北老河口至草店之间，其所辖的作战部队，共计有七个集团军、一个江防军，辖二十个军、五十几个师、四个警备旅。此外，还有炮、工、通讯部队等兵种，全部兵员四十万人以上。所以要集结这么多的部队，是与日寇所谓“广田三原则”的对抗。“广田三原则”即“封锁海口，闭塞谷口，以战养战”，企图占领沙市、宜昌，扼住长江三峡咽喉，然后诱降困守西南的蒋介石。

江防司令部设在宜昌，看守重庆大门。以李延年的第二军控制巴东、秭归附近，作为声援。但实际上江防要塞的防御能力却十分薄弱，阵地上只配备数门苏联援助的野战炮，而且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品。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江防部队配合友军对日寇发动一场规模较大的冬季攻势。

十二月七日黄昏，二十六军及七十五军同时强渡襄河。

七十五军以第六师沈澄部及十三师方靖部为第一线攻击部队，预四师傅正模为预备队。

在发动攻击之前，方靖先遣便衣小部队潜入东岸，对河沿日寇几个小据点暗中包围。当大部队发动强渡攻击时，便衣小部队同时对被围据点的敌寇开火，很快就击破据点，歼灭守敌。因此，第六师由黄家场附近渡河时，几乎没有受到阻击。随后

十三师也安全渡河。

十二月八日，二十六军方面：四十一师丁治磐部于拂晓前已将多宝湾的守敌两个中队大部歼灭，残敌利用建筑物负隅顽抗；七十五军第六师向张截港的守敌进攻，并向东扩大正面，以确保与后方的联络，十三师向永隆河附近的守敌攻击前进。

九日，二十六军四十一师对多宝湾市内坚守核心工事中的敌人仍未完成歼灭任务；七十五军第六师围歼张截港守敌也未得手，十三师夜袭召议场守敌，为强大火力所阻。

江防总部调集七五野战炮助战，但由于敌人的工事十分坚固，七五炮威力不够，未能奏效。

十日，敌增援部队已由汉宜路方面赶至，并有战车源源而来。敌增援部队首先向十三师的三十七、三十八团攻击，激战终日，互有伤亡，不分胜负。预四师由旧口河赶来增援，才将进攻的敌人击退。另有一股日寇向四十一师攻击，也十分猛烈。在潜江方面约有一个大队增援张截港的敌人，向我第六师反攻。

战局逆转，敌人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旧口河方面的敌人协同东西夹击，封锁我渡口。江防军已陷于多宝湾、永隆河、张截港三角地区，不能发展。

十一日，敌增援部队继续源源而来。

第六师在张截港方面伤亡较重，十三师派出三十七团第一营增援，与敌激战终日，该营长黄宪武、副营长钟克烈以及官兵二十余人壮烈牺牲。

这天晚上，日寇一个大队在十几辆战车的掩护下，侵入多

宝湾市内二十六军四十四师的防地，激战终夜。

三十三集团军在钟祥方面攻击也无进展。

十三日，各方面进攻部队都没有进展，已呈现疲惫状态，而日寇的反击力量却在增强。

我方处于被动局面。尤以二十六军抵抗能力较弱，频频向江防总部发出告急电。郭忏根据这一情况向重庆军委会电话请命，要求撤回进攻部队。据说当时接电话的是张治中，回答说：“态势不利可以撤回，但应首先征得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同意。”接着，郭忏因为二十六军频频告急，唯恐有失，匆忙下令撤回，并未征得李宗仁的同意。

七十五军军长周晷接到撤退命令后颇为踌躇，便与方靖商议：“兵半渡被击，散易全军覆没。现在我们要渡过河去，只有一座浮桥，一夜之间哪里能渡过一军人？天亮后倘若日寇来轰炸，我们无法抵抗，岂不危险？”方靖考虑了片刻，然后提出建议：“预四师近在汉水长脑源浮桥旁，可以先行渡河；第六师继后。我率十三师越过永隆河侧旁汉宜路向北突进，另谋突围之路。”周晷接受了这一建议，分兵撤退。

十三师按计划于当夜越过永隆河、拖船埠、观音湖之间，第三日强行突过汉宜公路，经抑门口山区，穿过京钟公路，进入大洪山，一场声势浩大的冬季攻势就如此结束。

李宗仁、白崇禧与陈诚素有芥蒂，而郭忏是陈诚的左右臂，现在发生不经请命擅自撤军之事，李宗仁如何能善罢甘休？便向蒋介石告郭忏“功败垂成”。郭忏听了也颇为后悔，便找方靖商议：“李宗仁告一刁状，老头子正在因为各战场不利有气，弄

不好就会拿我当出气筒。唯今之计，只有再打过河去——我知道，二次渡河是很困难的，但是，不这样别无办法。你能不能带头再打过去呢？”方靖虽有片刻犹豫，最后慨然允诺：“好！士为知己者死！我愿率十三师为先锋！”

方靖率十三师再渡襄河，经过苦战，虽然渡河成功，但是无法展开。

这一次，蒋介石并未治郭忏之罪，尔后宜昌失守，却两罪齐加，将郭忏逮捕，投入重庆北碚军人监狱。后来经陈诚力保，蒋介石批复：“准予所请，命郭忏于第六战区长官部服务，支少校薪。”郭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可谓老资格，在“国军”将领中也是有名人物。以曾任中将总司令的资历而支少校薪，一时引为笑谈，都说郭忏象清朝年羹尧一样，一夜之间连降十三级，贬为守城门的小吏。

调任十一师师长

一九四〇年四月，方靖调任十一师师长，晋级中将。当时十一师在长沙，暂属八十七军周祥初战斗序列。这一调令曾被周暑扣住，打电报给陈诚，挽留方靖仍在十三师，陈诚回电说：“方靖资望所在，十一师非他莫属！”随后是十三师的几个团长要求带部队跟方靖走，方靖再三解释：“我虽晋级中将，职务还是师长，十三师怎么能跟我走呢？等以后我当了军长，你们再来找我吧。”

陈诚所说的“资望所在”，是指方靖在十一师的根基很深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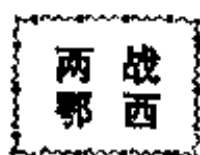
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部队，所以很看重，以最好的武器装备，以最优秀的将领任师长。十一师自成立以来，在陈诚任师

长之后，第二任师长便是罗卓英。再接任的都是黄埔将领。黄埔将领在黄埔军校受训期极短，而且所学课程只不过是团一级教育，随后虽有实战经验，究竟不如陆军大学毕业的军事知识渊博。因此陈诚便想挑选一名精干的陆大毕业将领来加强他的这支基干部队。经多时选择，终于选中了陆军大学第九期毕业的叶佩高。论才华韬略，叶佩高可谓陆大将领中的佼佼者，但是他在十一师中毫无根基，而这个部队是最排外的，因此遭到下面团、营长的抵制。十一师副师长胡璉，原是十一师的老人，作战倒还勇敢，生活作风却不知检点，好嫖好赌，而且野心很大，不甘于人下。叶佩高到职后，胡璉升正无望，便与叶佩高捣乱，煽动下面几个团长轮番请病假，最后他自己也称病回老家去了。弄得叶佩高无法指挥部队，只好请求陈诚另行委派他职。

方靖是十一师的老人，从十一师成立起，就在十一师任职。当时的副师长以下军官，多是他任十一师当团长时的营、连、排长，这就是陈诚所谓的“资望”。

方靖到了十一师，把几个团长找去，对他们说：“我的资历你们是清楚的；你们的情况我也了解。可以说知己知彼，心照不宣吧。叶师长的事不提了，且说我吧。我要是不高升，谁也别想撵走我——这一点大概也是彼此都有充分信心的。我对你们别无多求：服从命令听指挥，仅此而已。谁要是跟我要花招，哼哼，哼哼……”他让对方去设想严重后果。对胡璉却以暂不理睬的办法空置一旁，直到十一师参加宜昌战役后，调往四川梁山县整训时，他才写信给胡璉，劝对方早日归部。胡璉既是方靖黄埔第四期的同学，又是方靖的老部下，料想争不过，只

得乖乖回来。他见了方靖，无可奈何地说：“唉呀，你来十一师干什么？有你这样的老资格，我们何日能出头？”方靖打着哈哈说：“你帮我好好干啊，干好了我升上去了，一定保你当师长！”大约胡璉也别无他法，所以在方靖任职期间，他果真十分卖力。



一九四〇年四月底，十一师奉命开赴当阳。五月中旬，经常德、津市地区抵达当阳时，鄂西一带形势已经十分紧张。

原来在我方发动冬季攻势后，日寇即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发动春季攻势，对桐柏山脉、江汉平原和鄂西北的重镇襄樊进犯。

担任襄樊、随枣、大洪山区守备的是黄琪翔的十一集团军、孙震的二十二集团军、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担任宜城沿河水西岸至荆门守备的是王缙绪的二十九集团军、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统一由张自忠指挥。

日寇攻击的重点是指向襄樊。各集团军抵抗不住猛烈的攻击，纷纷后撤，很快丢失了襄樊。这时守备汉水西岸的张自忠将军看到日寇主力到了襄樊，其后方空虚，有机可乘，便命令两个集团军全线出击，他亲自率领三十三集团军的主力，跨过汉水，进入钟祥以北的洋梓镇、长寿店地区，大胆地向日寇的侧背猛击，迫使日寇不得不放弃襄阳，退守随县。

这次战役能迅速扭转败局，张自忠将军实为有功。但是在日寇方面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目的在摸清地形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作战部署。

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寇开始了新的攻势。

日寇十分阴险，发动这次攻势之初，表面上仍是循着春季

攻势时的老路，首先猛扑襄樊，连续击破在桐柏山地区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及随枣地区的汤恩伯三十一集团军。占领了襄樊后，又故作声势，陈师耀兵，大有继续西进，直捣老河口、均县，摧毁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模样；而对于南翼的岳口、旧口、钟祥等沿汉水线的阵地，却故作守势，按兵不动。但在阵地后方天山、京山等地，则秘密集结有力部队，窥伺时机，张弓待发。李宗仁中了日寇这一声东击西的阴险之计，以为它的目标仍旧是夺取襄樊，侵占整个江汉平原，于是加强了随枣前线的兵力，形成第一线防御阵地带；又积极在汉水、襄樊、唐白河之线构筑工事，严密守备，作为第二线防御阵地带，企图在这一地区与日寇决战。

五月初，日寇推进至枣阳前线，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日寇凭借炮火优势、飞机轰炸、坦克开路，造成我军惨重伤亡，我军相继丢失阵地。

五月十日，日寇逼近汉水、襄樊、唐白河之线，前线指挥官纷纷向李宗仁告急。李宗仁见江防军正面的敌人掩旗息鼓，便严令江防军抽调两个军至襄樊以北的新野——唐白河之间集结。郭忏苦苦求情不允，无可奈何，只好派周晷的七十五军和李及兰的九十四军前往，于是江防空虚，这正是日寇企图达到的目的。

五月中旬，担任宜城南北、汉水西岸守备的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看到日寇击破随枣前线阵地，逼近襄樊重镇，情绪激昂，亲率七十七军和五十五军七十四师，由宜城附近渡过汉水，向日寇展开猛攻。这一次敌人并未用主力占领襄樊，

却将有力部队控制在后面。张将军率部攻至新集平林附近，正与强敌相遇。日寇又将前线攻击部队的一部转锋向南，致使三十三集团军陷于两面夹击之中。

战斗十分激烈，官兵伤亡惨重，张自忠将军亲临南瓜店前线督战，不肯后退一步。两军肉搏，张自忠将军为国壮烈牺牲！

日寇击破三十三集团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前线加强攻势，迅速推进，五月十九日到达襄阳附近，强渡汉水，二十一日轻取襄阳，二十三日进占南漳，即以南漳为轴，转锋向南急进。

这时，日寇的企图才暴露出来：雄踞大巴山谷口，扼住长江咽喉，侵占川鄂豫湘四省通衢的宜昌。

日寇为集中优势兵力，自动放弃襄阳，倾全力进攻宜昌，战事重心骤然转至江防军的正面。郭忏的江防军左翼原依托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未作任何战备；三十三集团军败退，日寇便如入无人之境。此时防守宜昌的七十五、九十四军已经调走，宜昌成了一座空城，岌岌可危。郭忏只得请求重庆统帅部批准，将李延年的第二军由巴东、秭归调到荆门、当阳地区，迎击北来之敌。

日寇主力沿襄沙公路前进，侵入荆门；从南漳出发的日军一部，侵入当阳东北观音寺；汉水东岸对峙的日寇，同时配合呼应，炮击强渡，猖獗一时。江防部队李延年的第二军首先去荆门、观音寺一线迎击东北两面之敌；守备汉水阵地的萧之楚军感到侧背威胁太大，不得不放弃汉水第一线阵地，退居沙市——建阳驿第二线既设阵地，左依杨勃五十五师河溶阵地。

六月八日，第二军被压迫至远安附近，荆门、观音寺失守，

日寇复攻当阳。

死守
当阳

当阳地当要冲，是保卫宜昌的屏障，所以抽调战斗力最强的十一师前来防守。方靖以三十三团占领当阳南面；以三十一团占领当阳西、正面及西北的九子山高地；三十二团占领当阳东正面；以补充团为师预备部队，守卫在城西长板坡。各团加强原来构筑的防御工事，各种设施相当周密。五月底工事大体完成，方靖集合部队，激励将士说：

“昔日曹操率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刘备不过一孤军，凭张翼德、赵子龙两员骁将，在当阳长板坡杀得曹兵丢盔卸甲，人仰马翻。赵子龙单枪匹马在长板城七进七出，张翼德在当阳桥上一声断喝，吓得曹操收了青龙伞，跌死夏侯德！这就是一人拼命，万夫莫当！现在我精锐的十一师奉命守护当阳，日寇并没有八十三万，甚至连八万三都没有，难道我们就抵挡不住吗？倘若当阳失守，宜昌不保，日寇就会将我们窒息在西南一角。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到了！我师必须人人是张翼德、赵子龙，使日寇有来无回！”

全师将士斗志昂扬。

十一师奉命归第二军李延年指挥。其左侧便是第二军防地。六月九日，第二军七十六师于观音寺败退西撤，日寇即向当阳十一师阵地进攻，十一师奋起抵抗，战斗十分炽热。下午二时，方靖接到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电话说：五十五师河溶以东阵地已被日寇击破，他与该师电话中断。日寇正由河溶西向鸦雀岭急进，二十六军正面打得十分艰苦，看情况很难支持。

他要方靖自行掌握进退。方靖放下听筒，愤然骂了一句：“革包！”不为所动，决心死守。

日寇向十一师阵地疯狂进攻，多次突入阵地，展开残酷的肉搏战，均为将士们英勇击退。当阳西北的九子山高地争夺尤为激烈，日寇不惜沉重代价，拼命猛扑，三十一团坚决抵抗，并相机出击，相持至黄昏，日寇攻势逐渐减弱。但是，这时左右友军都已败退，当阳成为孤城。李延年唯恐十一师有失，不好向陈诚交代，迭命方靖放弃当阳，转移至大峡口、风洞河一带山地占领阵地，靠拢第二军，继续拒敌深入。

二十六军是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时期投诚的军阀部队，士气低落，而且萧之楚尚有严重的保存实力观念，这固然是蒋介石对杂牌部队不能平等待遇所造成的。二十六军在河溶一带败退后，本应向宜昌退却，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赢取时间。萧之楚却将部队带到沿江董市、白洋、红花套、古老背等多处渡口，渡过长江南岸，脱离战场，隔岸观火，以至沙市至宜昌之间成为真空，日寇得以直叩设防无兵的宜昌大门。

李宗仁的长官司令部远在老河口草店，对江防军指挥失灵，更难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况，急得手足无措。重庆统帅部得悉这一情况，更是焦急万分！蒋介石为挽救这一危局，决定在重庆设指挥部，专门指挥宜昌方面战事。关键时刻，蒋介石又命陈诚担任指挥官。陈诚受命，匆匆组成临时指挥机构，于六月七日进驻宜昌附近的三游洞，后因敌机干扰，又移至石牌、三斗坪附近。

陈诚的组织能力极强，很快和前线各部队取得联络，掌握

了指挥权。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急调正在重庆、万县整训的十八军一九九师、十八师，由长江上游轮运宜昌担任防守；第二个措施便是对前线部队需要的粮食弹药等物资直接负责补给。重庆统帅部批准了陈诚所请，使前线混乱局面得以扭转。

六月三日，十八军在军长彭善率领下，由驻地轮运宜昌。罗广文的十八师在六月八日深夜到达，随即进入市区。

江防总司令郭忏和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对罗广文匆匆交代：日军已由沙市、当阳之线，分数路正面并进，情况十分危急。他将宜昌的工事位置及阵地设备图交付完毕，便离开了宜昌。

十八军失 守宜昌

六月十日，日寇自古老背、鸦雀岭、双莲寺三路进兵，逐渐迫进十八师阵地。十一日全面展开攻击，飞机大炮，继之以步兵猛扑。十时，右翼五十二团阵地被突破，日寇拥入，向位于西北的飞机场发展，切断十八师各团之间的联络，师指挥部也无法掌握各团。守城的五十四团团长沙宣猷首先潜逃，部队顿时大乱，纷纷夺取船只过江，有的甚至泅渡逃向宜昌南岸。

彭善见战局无法挽救，便命罗广文撤至黄柏河西岸收容残部，又命师参谋长赵秀昆指挥五十三团守镇镜山，传令一九九师由驻地向日寇进袭，企图夺回宜昌。这自然已不可能。

宜昌失守，大后方人心惶惶。蒋介石恐遭舆论谴责，“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始终不敢痛快承认事实。一方面说：敌方宣传于六月七日占领宜昌“纯属子虚”，一方面又编造许多自相矛盾的神话，什么“收复宜昌，歼灭大量敌军”云云，什么“以雷霆万钧之势肉搏敌阵……敌人伏尸塞途，全线瓦解”云云，真

是妙笔生花。

陈诚在恩施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会议，检讨宜昌战败教训，并对失职将领予以处分。除郭忏之外，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免职，以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继任；新编三十三师师长张进希免职，以杨宝毅继任；十八军军长彭善免职，以一八五师师长方天继任；七十五军军长周晷作战努力，升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陈诚在会上郑重地说，要听取各将领的意见，于是十一师参谋长尹作干起立发言：“这次宜昌战役失败，从十一师来说，原因在于士气不振……”话犹未了，陈诚勃然大怒，指着尹作干说：“十一师官兵是好的，你的师长方靖更好，就是你个人萎靡不振！”这样一来，其他的人再也不敢讲什么，会议不欢而散。

陈诚是以十一师起家发迹的，所以决不允许别人说一句十一师的坏话。事后尹作干被免职，调十八师的参谋长赵秀昆继任十一师参谋长。

十八军在宜昌战役中损失较大，奉命进四川整补。十八师仍回驻重庆北碚，军部驻青木关；一九九师仍回驻万县；十一师归回十八军建制，驻四川梁山。

彭善被免职，原非陈诚初衷，而是蒋介石的旨意。他对陈诚说：“彭善作战不力，尽报假情况，这种人怎么能用呢？”陈诚调方天为十八军军长，也颇遭人议论。继任十三师师长朱鼎卿就很有意见，他曾当面对陈诚说：“为什么要从别的部队调方天当十八军军长？方靖为什么就不能当十八军军长呢？”陈诚说：“方靖在十一师本来是过渡的，我另有安排。”

方天是江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陆军大学十一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陆军大学正期毕业的并不多（多是旁听生或将官班短期训练毕业的），所以颇为自豪。但是他在“国军”中的资历并不深，尚不及手下几个师长。正因为如此，他对几个师长采取不过问的谨慎态度。可是，他颇有心计，经常搞些小动作排除异己。十八军副军长罗树甲原是湘系将领，资格较老，方天想把他排出，于是规定军部官佐自军长以下每天都要参加早操。军司令部在山上，下山做早操要经过两三里路的陡坡。罗树甲已年过半百，身高体胖，如何吃得消？搞了不几天，便自动辞职回湖南老家去了。方天事后与人谈起这事，常自鸣得意。

方天的另一件排除异己的事，曾在“国军”中轰动一时。

北伐战争以前，军队的待遇十分优厚。士兵待遇前面已经讲过，军官待遇是：

上将八百元；中将五百元；少将三百二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少校一百三十五元；上尉八十元；中尉六十元；少尉四十元；准尉三十二元。

那时发的“饷”是银元，后来改为钞票。抗战以前，物价较稳，有了这样优厚的薪饷，生活比较富裕。“九一八”事变后，军政部规定发“国难薪”，上将至上校减半，少校六折，尉官打七折。士兵待遇也略有减少。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难当头，紧缩开支用于抗战，自然必要。但是，自从“九一八”以后，物价翻滚上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迅速贬值，当局却不采取相应措施来克服薪饷减

少后造成的生活困难，一味沽名钓誉，自然难免要发生问题。

一些将领大多拖家带口，负担甚重，仅靠“国难薪”根本无法维持。一九四五年八月，方靖去陆军大学受训期间，亲眼看到这样一件事：军政部一个少将高参，每天晚上下班，用报纸把食堂的剩饭包了带回家去。后来为门卫发现，不许他带，他竟在大门口痛哭流涕，说他家里一大群人，靠他的少将薪饷根本不能维持起码生活，如不允许他带剩饭回家，妻儿老小只能上街乞讨。这种凄苦景况，蒋介石集团中的人非但不同情，反倒笑他无能！那么，“有能”者又当如何呢？不外乎贪污和走私了。

这个少将固然“无能”，但其客观原因还在于无权。参谋——即便是高级参谋，也不过是幕僚而已，除了固定薪饷外，只能靠主官赏赐。主官的赏赐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主官有一笔特别办公费（譬如少将旅长的特别办公费是二百元），这笔钱可由主官赏赐给部下，也可以独吞；另一是主官向上级借来的活动资金，主官可以分一部份给幕僚存入银行。在蒋介石统治期间，私人银行的利息很高，以利息贴补生活，也可以勉强维持起码生活。但是，倘若遇到一个吝啬的主管，做幕僚的就苦了。

方天在钱财上是看得很重的。他的参谋长梅春华有两个老婆，子女众多，仅靠少将薪饷难以维持生活，便利用军部的骡马，以数千元作资本跑生意，从重庆驮盐到梁平换土产。这种做法，实际上比贪污吃空缺要好得多，而且当时各部队军官做生意成风，算不了什么大事。却不料方天因梅春华是陆军大学

一九四三年初，暂九军由第三战区开到三斗坪归六战区指挥，陈诚再一次施展吞并手法，将军长冯圣法调任军委会高参，升任方靖为暂九军军长。

尽管是由副军长升任军长，方靖却十分烦恼。原因有二：其一是由十一师师长升十八军副军长，距最荣誉的十八军军长宝座，只有半步之差了，不料在这时竟会调离十八军；其二是暂编第九军所属两个师，是暂编三十二师和暂编三十四师。军冠以“暂”，师也冠以“暂”，那么他这个军长的头衔上，无形中也有一顶“暂”字帽了，随时都可以撤销的。素有涵养之称的方靖不能保持沉默了，便向老长官陈诚表示了委屈。陈诚为了安抚这员爱将，给了个六十六军的番号。六战区参谋长郭忏打电话告知方靖：“辞公给了六十六军番号。这个六十六军曾两次被歼，有点不吉利，你要不要啊！”方靖哈哈大笑：“我是军人，哪来那么多迷信！何况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嘛！”于是暂九军改为六十六军。陈诚又将原属十八军的一九九师和九十四军的一八五师与暂三十二、暂三十四师对调，使六十六军的阵容骤然起了变化，成为陈诚军事集团中的劲旅。

一九四三年二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孙连仲代理，实际大权操在参谋长郭忏之手。五月下旬，日寇向鄂西进犯，陈诚不得不从云南赶回恩施指挥作战。

当时石牌成为争夺重点，守军十一师师长胡璉部与日寇发生激战。日寇屡攻不下，便有越过石牌向西迂回进攻三斗坪的

趋势。重庆统帅部再次大为震动，深恐日寇乘虚直入四川，于是下决心单留十一师守石牌要塞，其余部队一律撤至茅坪、野三关地区组织新的防御，并从湖南调七十九军王甲本部赶到聂家河，方靖的六十六军一八五师急行军赶到五峰以东，直插洋溪长江岸边，一九九师赶到梁家山、聂家河。日寇唯恐归路被切断，五月三十一日全线撤退。

当时十八军军部及十八师正在慌忙退却中，闻知日寇已撤退，军长方天喜出望外，立即向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告。孙连仲、郭忏一面向重庆“报捷”，一面命令全线各部队停止后撤。并嘱十八军派人将撤退中的江防军总部追回来（因撤退中无通讯联络）。十八军副军长罗广文奉命去阻拦后撤部队，他用号音传达命令。但是撤退中的各部急如漏网之鱼，根本不听号令。罗广文素来躁，火气上来，就命令用机枪向撤退部队扫射！

六战区长官部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此时正需要“前线大捷”消息稳定人心，于是亲自指示军令部打电报给方天，要求上报战绩及参战将领姓名，以便大加宣传，并给予奖励。方天命参谋长赵秀昆闭门造车，瞎报一通，军令部拿去粉刷一番，再经过“中央社”记者的描绘点缀，“中央电台”广播小姐便吹得有声有色了。什么“石牌要塞成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什么将领“誓与要塞共存亡”，什么“待敌陷于我火网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还有具体数字：“积尸之多，仅在北斗冲一地，即有二千三百具。其它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法统计……并据目击者称，连日敌伤员送至宜昌已达万余人……”如此弥天大谎，竟然公之于世，可笑也可怜。

蒋介石还假戏真做，除了在大后方传令大肆庆祝外，还发起全国性慰劳鄂西将士活动，由国民党元老张继、孔庚分任慰劳团正、副团长，到恩施慰劳。陈诚也先期赶到恩施，主持授勋仪式。孙连仲及八路军的军、师长和参谋长都得到一枚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而真正在这一战役中起到扭转逆势的六十六军和七十九军却只字不提，难怪这两个军的将领跳起脚来骂娘！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寇又犯湘北，发生常德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有七个军，其中有方靖的六十六军。日寇一度攻占常德后，见十八军从北面赶到，第十军从南赶到汉寿，怕遭到夹击，便自动撤出常德，集结于常德以北地区。

正当日寇动向不明之际，脱离主力部队而留在湖北松滋地区打游击的六十六军一八五师五五四团朱超群营，偶然截获敌机投下的“着十三军团总退却”命令，立即向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报告。长官司令部下令全线追击，可惜为时已晚，斩获不多。但是，这种情况是自抗战以来未有过的，所以六十六军甚得嘉奖。

一九四四年九月，方靖由六十六军军长奉调任七十九军中将军长。